



## 【中外语言学研究】

## 论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

邢向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陕南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方言资源。在这里, 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语等构成了复杂的接触关系。近年来已经基本摸清了陕南方言的分布和归属情况。进一步的研究, 在理论取向上应当关注下述问题: 方言接触理论, 地理语言学研究, 移民历史与方言描写的互相结合和互相印证, 方言威信及方言演变的方向, 方言交融与文化交融的关系; 研究方法主要是: 系统深入的调查和描写, 地理语言学方法, 社会语言学方法。

**关键词:** 陕南方言; 方言接触; 理论取向;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8)02-0127-07

## 一、陕南方言的基本状况

陕南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方言资源。最近几年的调查发现, 陕南地区不仅存在中原官话、西南官话, 而且有江淮官话、赣语。安康市汉阴、石泉等地还有不少来自湘语区的移民。商洛山阳县广东坪居住着来自广东的客家移民。在汉中市境内, 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发生接触; 安康市境内, 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赣语发生接触; 商洛市境内, 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赣语发生接触。

## (一) 中原官话

陕南的中原官话分属于关中片、秦陇片、南鲁片。其中大多数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语深度接触, 因此具有一些当地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的特点, 有些方言的混合程度很高。如汉中市略阳县城话, 外地人乍一听, 似乎是西南官话, 因为其调值与西南官话相似。但经系统调查, 其基本特点如古入声字的归派等, 仍然属于中原官话。也就是说, 略阳一带方言, 在与西南官话长期接触以后, 调类仍属中原官话, 但调值则发生了变化, 逐渐向西南官话漂移。又如镇安县城话属于“本地话”, 保持了中原官话的绝

大部分特点, 如古入声字的归派; 虚 ≠ 书, 权 ≠ 船; 但 [tʂʂ' s] 的合口呼字读 [ɥ - ] 类韵母, 却是境内江淮官话的影响所致, 考虑到镇安县西部大多属于江淮官话的地盘, 东部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布犬牙交错, 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邢向东、郭沈青(2005)<sup>[1](P364-371)</sup>、邢向东(2007)<sup>[2](P372-381)</sup> 的论文中, 将商南城关话归入中原官话南鲁片, 全县属于南鲁片与赣语杂处的方言。

陕南地区属于中原官话的方言, 商州、洛南、山阳县城及北部、丹凤县城及南部话具有典型的关中片方言特点, 城固、洋县、西乡县城及北部、安康、旬阳五处方言与关中片关系密切, 这九处方言属于关中片。略阳、勉县、宁强北部、南郑县城以北、汉中南关、西关方言属于秦陇片。

镇安县城及东部、平利城关、白河城关受境内江淮官话的影响最大、混合性最强。语音上兼有竹柞片(见下文)、中原官话信蚌片、秦陇片、关中片的特点。从人口来源等方面看, 这一带的本地话与关中片关系更为密切, 与秦陇片关系较疏远<sup>[3](P367-372)</sup>。因此, 这三处方言当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与江淮官话竹柞片杂处的方言, 县城暂时归入关中片。

收稿日期: 2007-09-15

基金项目: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专项基金(200409),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4-0957)

作者简介: 邢向东(1960—)男, 陕西神木人,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汉语方言研究。

## （二）陕南的江淮官话和赣语

关于陕南的“下湖话”“下湖话”主要来自鄂东、皖西南以及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其来源地方言主要是江淮官话黄孝片和赣语怀岳片、大通片，这是清代湖广、安徽及江西等省向陕南移民的结果。这些方言有各种称呼，有的是自称，有的是他称，其中来自鄂东的多称“下河话、下湖话、黄州话”等，来自安徽的多称“江南话”，商南称“蛮子话”，口语和县志中则笼统地称之为“下（夏）湖话、客户话、客伙话”等。我们主张选择一个略微模糊的、自称与他称兼用的名称来称呼它们，所以叫“下湖话”。这些方言主要分布在商洛市柞水、镇安、山阳、丹凤、商南，安康市汉滨、旬阳、平利、白河等九个县区，与湖北竹山、竹溪方言连成一片，其他县有少量分布。其中可大别为两支（据张德新先生等调查，汉阴一带有湘语分布<sup>①</sup>，据孟万春调查，商州还有客家话<sup>②</sup>。）一支源于江淮官话黄孝片，其典型特点有下列三点，以镇安县云盖寺镇为例：①撮口呼读[ɥ-]类韵母，声母为[tɕ tɕ' ʂ ʐ]，来自古知系、见系三四等合口字：猪 = 菊[ɥ tɕɥ]，船 = 权[ɥ tɕ' ɥan]，顺 = 训[sɥn<sup>2</sup>]，如 = 鱼[ɥ ɥ]；②有五个单字调：阴平[42]，阳平[553]，上声[55]，阴去[214]，阳去[33]，去声分阴阳，古清入、次浊入归阴平，全浊入归阳去；③古蟹止山臻撮合口字逢端系字读开口：

	平利 <sub>洛河</sub>	商南 <sub>富水</sub>	团风	英山	宿松
大前年	向前年	先前年	向前年	向前年	先前年
大前天	向前天	先前日	向前日	向前日	先前日
上午	上昼	上昼	上半天	晏昼	上昼
下午	下昼、下半天	下昼	下半天	下昼	下昼
凌晨	粉粉亮	麻麻亮	麻粉亮	麻麻儿亮、 蒙蒙儿亮	麻亮
垃圾	渣滓	灰	渣滓	渣滓	邋遢
颈	颈脖子	颈脖子	颈	颈	颈
胳膊肘	捣司拐	胳膊肘子	倒拐	档司拐儿	倒手杵倒襟杵
父亲	暖爷	爷	爷、父儿	父、大	父哇、爹、爷
母亲	依	妈	姆妈	丫、姨	姆妈 姨呀娘
外爷	家公	家公	家公	家爹	家公
外婆	家婆	家婆	家婆	家奶	家婆
收拾	捡拾	收拾	收拾	捡、捡敞儿	收拾
吃	喫	喫	喫	喫	喫
睡觉	困醒	困醒	困醒	困醒	睡瞌睡
亲吻	打破儿	亲嘴	斗嘴	打破	作嘴

对[teɪ<sup>2</sup>]，罪[tsei<sup>2</sup>]，醉[tsei<sup>2</sup>]，乱[lan<sup>2</sup>]，短[<sup>c</sup>tan]，墩[<sub>c</sub>tən]，孙[<sub>c</sub>sən]，少数方言读齐齿呼。这一支下湖话是黄孝片方言区移民的后代使用的方言，是鄂东北方言移入陕南以后，经过与其他方言的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江淮官话变体，当属江淮官话。至于名称，为了反映它与湖北竹山和竹溪地理上相连、方言特征相同的事实，可参照《中国语言地图集》“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名称<sup>[4]</sup>，采用两个下湖话分布最广、且能代表陕鄂两省的县名，称之为“江淮官话竹(山)柞(水)片”。

另一支源于赣语怀岳片、大通片，其特点是：①古浊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今一律读送气清音；②部分方言咸山摄一二等字有别（商南、汉滨牛蹄等）；③部分方言保留独立的人声调（山阳宽坪、镇安木王部分、汉滨牛蹄）；④去声分阴阳；⑤古知系、见系三四等合口字读[tɕ]组声母，[ɥ]类韵母<sup>[5]</sup>③（牛蹄话音系由研究生杨运庚、周海霞提供）。前三点与第一支不同，后两点与第一支相同。

上述两支方言在词汇、语法方面与周围的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但它们两者之间的词汇、语法差异并不显著。下面以平利洛河、商南富水为代表，选取若干与陕南中原官话不同的词语，与江淮官话黄孝片的团风、英山，赣语怀岳片的宿松比较如下：<sup>[5]、[6]、[7]</sup>

① 参见张德新. 陕南湘语(蒲溪话)音系. 第二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宁)论文, 2006

② 参见孟万春. 商洛方言语音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2007届博士论文.

③ 参见郭沈青. 陕南赣语方言岛的特点与成因. 中国语言学会 13届年会(北戴河)论文, 2006

很湿	切湿	切湿	切湿	切湿	切湿
漂亮	排场	排场	牌子	体面	排场
没有	冒	冒	冒	冒、冒得	冒、冒有冒得
他们	渠几	渠几	他们	他得	渠者、渠几
这个	箇	这个	这、这儿	这的	这、帝
什么	么事、么子	么事	么事	么事	么事

比较显示,安康、商洛分别来自湖北、安徽的江淮官话与赣语方言之间,特征性的词语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对其中的相同之处,应当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母体方言的词汇就有相同点,鄂东方言与皖西南地域相连,其间的联系不止词汇,在语音上也有反映。李金陵指出:“宿松、岳西、潜山、桐城四县,几乎具有‘楚语’全部  $\eta$  及  $\eta$  一类韵的  $\eta$ 、 $\eta e$ 、 $\eta a$ 、 $\eta ai$ 、 $\eta an$ 、 $\eta n$ 。”<sup>[8]</sup>二是来到陕南以后,不同来源的下湖话杂处其间,词汇语法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如赣语的典型人称代词“渠、渠几”,与黄孝片关系密切的白河茅坪话同样使用。

### (三) 陕南地区的西南官话

陕南地区共有 13 个区县属于或分布着西南官话。陕南西南官话具有一定的混合性,主要体现在与中原官话、江淮官话之间的互相接触、感染、交融(如汉中市汉台区东街南街属西南官话,但却高频使用属于中原官话的指示代词“兀”),以及西南官话不同片的特点兼而有之。汉阴等少数西南官话还杂有湘语的某些特点(如汉阴城关赵家河村“飞灰”不分,“冯红”不分,统读  $[x]$  母)。从音类来看,其中的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① 蟹止山臻四摄合口字今韵母读合口呼还是开口呼;② 遇通入摄端系字读  $[u]$  韵还是  $[ou]$  韵;③ 知系字今声母读  $[t\ t' \ s \ z]$  还是  $[t\ t' \ \text{ʃ} \ z]$ <sup>[9] (P168-176)</sup>。其中,汉中市镇巴、宁强等方言显示西南官话成渝片的特点,蟹止山臻合口字读合口呼,遇通入摄端系字读  $[u]$  韵,知系字读  $[t\ \text{ʃ}]$  类声母,安康市几县的方言则反映出相反的特点。不过,留坝、佛坪、汉阴等在上述几个方面互有参差,带有一定的混合色彩,显示不同来源的西南官话互相交融,恰与陕南西南官话区移民的来源相互印证<sup>[10] (P119-138), [2] (P372-381) [11], [3] (P375-412)</sup>。

## 二、调查研究的现状

### (一) 已有的调查成果

20 世纪 60 年代的汉语方言普查,曾经调查过

陕南方言,这是陕南方言研究的序曲。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纂,则正式拉开了陕南方言研究的大幕。在编纂《中国语言地图集》的过程中,张盛裕、张成材二位先生实地调查了陕南各县城的方言,并已发现陕南存在“客伙话”。不过之后出版的《地图集》将陕南方言分别划归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没有反映“客伙话(即下湖话)”的存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方言大类的归属,除了未指明存在江淮官话、赣语、湘语等以外,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近年来,陕西省方言学者开始关注陕南方言,其中张崇等先生系统调查了汉台、汉滨、商州方言语音、词汇,并将三地方言词汇收入《陕西方言词汇集》张成材先生出版了《商州方言志》孙立新先生为陕南不少县志写作《方言志》对一些县的方言作了调查,并发表了《陕南方言略说》一文。张德新、周政二位先生,调查了汉阴、平利等地的方言,周政明确提出安康存在江淮官话的主张,并提出了安康境内江淮官话的分布<sup>[12] [6] (P77-183)</sup>,张德新提出汉阴存在湘语<sup>[4]</sup>。郭沈青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南客伙话的接触与历史层次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sup>[12] (P168-176) [13] [14] (P32-59) ①②</sup>,揭示了陕南客伙话的性质,指出了赣语方言岛的存在,并对陕南方言的分区及成因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为了《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持)和《中国语言地图集(增订本)》两个大型项目,邢向东实地调查了商州、镇安、平利、汉台、略阳、城固、镇巴、佛坪、宁强等地方言,通过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了解了汉阴、留坝、柞水、石泉、商南、白河等方言的情况,为《中国语言地图集》(增订本)绘制了两幅与陕南有关的地图<sup>[1] (P64-371), [2] (P372-381)</sup>。

### (二) 对成绩的估价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我们大体搞清了陕南方言的总体面貌与各种方言比较准确的分布状况,揭示了陕南江淮官话、赣语、湘语的存在与特点,对陕南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的特点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

① 参见郭沈青. 陕南客伙话溯源. 中国语言学会第 12 届年会(银川)论文. 2004

② 参见郭沈青. 陕南方言的地理格局与历史成因. 第二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宁)论文. 2006

陕南方言引起了方言学界的兴趣和关注,业已成为方言学的新热点。从宏观上看,应当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不过,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调查研究,大多是为了分区和摸底的需要而做的,除了个别学者,我们还没有深入到某个方言地区,就某县方言的整体面貌及其内部差异,开展真正的田野调查并加以系统的描写,准确充分地揭示方言事实。因此,迄今尚未出版一部内容比较深入的地点方言研究专著。方言学以描写方言事实为第一位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至于陕南地区不同方言之间的接触、交融、整合等提出的理论问题,更没有开始有深度的思考与阐述。不过,我们毕竟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因此,在“轰轰烈烈”的开头之后,需要开始扎扎实实的工作。

### 三、陕南方言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理论取向

陕南方言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进一步的深入则需要更加扎实的努力和理论方法上的自觉。

#### (一) 方言接触理论研究

陕南地处秦巴山地,过去非常封闭。在这个地区容纳了中原、江淮、西南三大官话方言,还有赣语、湘语、客家话等非官话方言。历史上,陕南经历了两次大的移民运动。因此,原住民的方言,明代成化年间移民的方言(北方方言为主,见下文)清代移民的方言(以南方方言为主)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接触关系。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运动中安置的北方人,这些人在陕南已经称为“老民”。另一次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在“湖广填四川”之后,移民到陕南的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西、广东等省的人。老民多居住在城镇和平川地带,新民多居住在山区<sup>[15] (P376-400), [10] (P119-138)</sup>。它们之间的接触史,大约是二百多年,目前仍然在互相感染,互相吸收,互相交融,同时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有些方言经过多年的演化,已经消融了原来的部分特点(如境内的湘语、客家话),有些则顽强地保持着从母体方言带来的特征,并对“本地话”施加影响。因此,陕南方言是研究方言接触、方言融合的活标本。

比如,不同方言之间发生密切、深刻的接触以

后,互相影响的方式是什么?层次是什么?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子系统,按照什么层次互相吸收、交融?在某个子系统内,又是按照什么层次发生吸收、融合?以语音为例,在声母、韵母、声调、音变等不同层面,发生变化的方言,哪些方面先变,哪些方面后变?在声调系统中,是调类先变,还是调值先变,还是连续变调、轻声更容易发生变化?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调类的混同要落后于调值的漂移。比如汉台区方言,由于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长期接触,两种方言的调值已经非常接近,但调类仍然不混,最典型的是入声字,东关、南关话一律归阳平,是西南官话的走向,西关、北关清入次浊入归阴平,全浊入归阳平,是中原官话的走向。北关话的一部分清入、次浊入混入阳平,是因为北关人口越来越混杂的缘故,除此之外,基本上互不影响。在同一个中等城市的不同区域,调类之间的差别竟然能如此完整地保持对立,可见调类系统是十分稳固的。而调值则比较容易互相影响。扩大范围来观察整个汉语方言,在某个大方言区内,不同方言的调类往往比较一致,而调值则千差万别,正与微观考察的结果相互印证。总之,经过分层次的考察,可以具体地揭示方言接触中,互相之间发生影响的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甚至可以采用跟踪调查的方法,观察方言交融的具体过程。

#### (二) 地理语言学研究

陕南的下湖话大多数来自汉江中下游地区,即使有些方言不是来自汉江流域,也是以汉江为通道,沿江而上到达陕南的。事实上,一些重要的方言特征,如蟹止山臻撮合口一等韵逢端系字读开口呼、齐齿呼,就是一个几乎贯穿整个汉江流域的方言特征。因此,我们可以以汉江流域的方言为观察对象,以大面积、多地点的调查为基础,绘制汉江流域的方言地图,从而更直观地反映方言特征的流播过程,观察陕南方言在更大方言区域内的地位,通过宏观的比较和微观的考察,深入探讨汉江及其支流在本流域方言特点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在南部方言到达陕南地区中所起的输送作用<sup>①</sup>。并在方言地图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考察方言接触的层次、过程、程度、结果等理论问题。

① 2006年12月,笔者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做短期访问,本文就是在访问期间开始写作的。其间到香港科技大学向同行作了《谈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的演讲,在交流中,张敏先生提出了这一点。朱晓农、孙景涛先生都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路,使笔者深受启发。笔者感谢他们高屋建瓴的意见和建议。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的邀请。

### (三) 移民历史和方言描写互相结合、互相印证的研究

陕南的外来移民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层是明代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运动后安置在陕南的, 他们的主要来源是北方地区, 如河南、山西、关中、山东、南直隶等<sup>[15] (P376-400) [16]</sup>。经过明末清初的农民战争、反清战争的蹂躏, 陕南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大概和当地的原住民一样, 或死于战乱, 或迁离了这个地区。第二层是清代乾隆朝“湖广填四川”以后迁徙到陕南的南方移民, 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西、广东等省, 是为操下湖话的人, 他们的主体是南方人。对这两次大移民及其形成的不同居民, 不应当笼而统之, 一概而论, 而要分清层次, 这样才能深刻认识他们在陕南方言现状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第一层次的移民到达陕南时, 陕南山高林密, 原住民本来就并不多, 经过宋金对峙和元末战争, 人烟更加稀少, 所以才成为“荆襄流民”的重要徙入地。“荆襄流民”得到附籍安置以后, 大都居处于汉江及其支流的平原、盆地、平坝地区, 地势比较平坦。看看各地为了纪念安抚流民有功的原杰而建的“原公祠”的地点, 就会明白这一点。清代移民到达后, 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已被占据, 所以只好在高山、交通不便的地区居住下来, 还有些“棚民”, 其实是为当时陕南高山地区的一些铁厂、木厂、茶厂打工的苦力, 有些人并没有长久的打算。不少“棚民”在当地的木材砍伐殆尽、植被严重破坏以后, 就又转徙他地了<sup>[10] (P136-139)</sup>。在现在的陕南方言中, 所谓“本地话”, 大概是过去的原住民和明代移民的方言融合而成的, 最少也有四五百年历史了, 大多已经定型, 多属中原官话, 不过不同县份之间差异很大<sup>[1] (P364-371) [14] (P32-59)</sup>。也有一些可能属西南官话。下湖话和大多数西南官话则是第二层次的移民带来的方言。笼统地谈明清移民对方言形成的作用, 甚至完全不加分别, 对于探求陕南方言的形成及其来源, 对于开展方言接触的研究极为不利,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移民和方言的关系, 应当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 在提到清代移民时, 不应笼统地提湖广、安徽、江西、四川等。其实, 陕南存在湖广、四川移民, 各县志中说得非常清楚, 葛剑雄、薛平拴、鲁西奇、陈良学等的著作都作了很多具体的研究。在考察整个陕南方言的格局、形成时, 引述他们的结论就足以证明自己的结论。但是要具体考察某县方言的形成和来源, 这样笼统的引述显然不够。这时, 应当像陈良学

《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所做的那样, 研究当地人的族谱和口碑材料, 具体分析他们迁出的省、县甚至乡村(不可能完全精确), 以此为基础来讨论该方言内部差异的形成及其原因, 如果某县、乡方言大致是从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区来的(比如安康汉滨区牛蹄乡的赣语区移民, 据安康学院杨运庚老师介绍, 就来自安徽太湖县), 那么, 我们就可以将该方言与其“源方言”进行比较, 具体入微地深入观察它到达陕南后的变化, 进而考察它和当地话、其他下湖话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 讨论移民与方言形成的关系以及方言之间的接触, 对一个具体的县区、乡镇来说, 应当微观地、具体地分析, 而不能笼统地谈湖广、安徽云云。这里的创新点在于搞清楚某一个方言同某些具体地区的关系, 而不是说一些人云亦云、放到哪里都适用的道理。

### (四) 方言威信与方言演变的方向

方言威信直接决定着该地区方言发展演变的方向, 因此是多方言研究中需要着力考察的课题。在不同方言杂处的状态中, 方言的威信有没有发生变化? 比如在一个县里, 最有威信的话是县城话或接近首府的话, 还是人口占优势的话? 人们在公共场所用什么话交际? 这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社会语言学问题, 要通过实际考察和研究才能回答。就目前的初步观察, “本地话”和下湖话在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 视不同地区新民、老民的比例来定, 比如在柞水县, 下湖话(内部有差异)几乎成了惟一的方言。在镇安县, 县城话是本地话, 四乡有本地话, 有下湖话(包括人数颇为不少的赣语方言岛), 县城话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但受下湖话的影响, 也带上了若干下湖话的发音特征。而商南县有三种方言: “呔子话”是商南旧县城范围内的方言, 是本地话(中原官话南鲁片), “瓜子话”为带有山西话特点的方言(中原官话关中片), “蛮子话”是南来的赣语方言, 三种方言没有任何一种属于权威方言, 但乡下人到城里办事还是要讲城里话, 同时, 随着母语为“蛮子话”的城里人越来越多, “呔子话”必然更多地受到它的影响<sup>[2]</sup>。这些方言的演变方向和过程, 可以通过跟踪调查的方法加以考察。

### (五) 方言的交融与文化的交融是否同步

陕南地区留存着形态极为丰富的民俗文化。西北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在这里汇聚, “紫阳民歌”是国家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安康一带的汉剧十分有名, 古老的习俗(荆楚文化中“巫”的作用十分显著)多得不可胜数, 饮食、建筑、

风俗形态各异,相映成趣。那么,在方言和民俗的保留上,是不是具有某种一致性,还是方言与民俗等文化因素的演变并不同步?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可能部分回答这一类问题,并对该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 (六) 历史行政区划与方言格局的关系研究

陕南地区历史上与川、楚关系密切,一直未与关中属同一高层政区。直到“元代陕西行省的设立,首次将秦岭南北三大区域置于同一高层政区中。”<sup>[17] (P21)</sup>“汉中谷地春秋时为楚地,秦惠文君时始入秦。”<sup>[17] (P24)</sup>“汉中谷地东西两部分,自三国分属魏、蜀后,除元、明合二为一外,一直单独分区,南宋之前甚至还分属不同的高层政区。这一政区建制对汉中谷地东、西两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不无关系。”<sup>[17] (P25)</sup>历史上的政区划分既然对文化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那么它不可能不对陕南的方言格局产生影响。因此,历史行政区划和方言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这方面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思考。第一,汉中、安康与关中(及商洛)长期分属不同的高层政区,元代始归于同一级政区,是不是应当把这种关系与自然地理形势结合起来,再同今方言格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换句话说,安康、汉中今大多归西南官话的领地,除了清代移民的显性因素,是否还有更早期、更深层的原因?它们的方言是否可能本来就同湖北、四川关系更密切?陕南方言中会不会叠置着“川楚方言→中原官话→川楚徽湘方言”多个层次?第二,安康、汉中两地历史上长期分治,今方言亦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固然与明清移民来源(东、西两面)有关,但会不会有更早期的原因?结合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再来看历代移民与陕南方言现今格局的形成,就可能得出更深入、妥贴的结论,以免对其成因作出失之简单的解释<sup>①</sup>。

### 四、调查研究的重点和方法

#### (一) 深入的调查和描写

选择若干复杂的方言,以县为单位,深入到乡镇农村,对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系统调查,作出全面系统的描写,最大限度地挖掘方言事实,揭示该方言的原始、真实面貌,为学界提供可靠、准确的第

一手材料,为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陕南不同来源的方言之间的互相接触、感染、交融奠定扎实的基础。目前我们在点上做的工作太少。在陕南这样的地区,方言调查不能仅仅停留在县城所在地。比如平利、商南县的情况,不深入到乡镇,根本不可能获得关于该县方言的真实的印象<sup>[18]</sup>。镇安县既有本地话,又有来自湖北、安徽的下湖话,还有回民话,不到乡镇去调查,深入到末梢地区,调查的收获和研究成果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陕南有不少方言岛,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sup>②</sup>。可以对某些人口来源集中的地区和当地人认为特殊的方言,作细致调查。如镇安木王、龙口方言,安康牛蹄方言,汉阴来源于湘语的方言,商州广东坪的方言等。

#### (二) 双向的比较

将本地话和下湖话描写清楚以后,可以同“源方言”进行系统的比较。比较的项目可以宏观一些,但也应深入到微观层面,以观察一些细部的情况的变化。如果下湖话的“源方言”比较清楚,则应选择那个对应的方言来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陕南的江淮官话、赣语(以及湘语、客家话)在离开母体二百多年以后,在整体杂处、局部独处的情况下,保留了哪些源方言的特点,消减了哪些源方言的特点?保留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特点比较稳固,不容易消变,还是它与本地方言或其他方言恰好存在共性,大家共同维持着这一特点的存在。消减的原因何在?是这个特点本身不太稳固,或在源方言那里已经露出消变的痕迹,来到新地方之后只是继续沿着以前的方向演变,还是本地方言、其他方言促进了这个过程?

反过来,也可以探讨在外来方言大量涌入甚至地域、人口占优势的情况下,本地话发生了什么变化?消除了哪些中原官话的特点?在哪些方面受到南来方言的同化?最早同化的是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哪一子系统?在子系统中又是哪一个更小的子系统?为什么?在与不同方言的杂处中,哪些方面易受感染?

#### (三) 研究方法问题

对陕南方言这样复杂的对象,除了描写语言学

① 在第四届官话方言国际研讨会(安康学院)上,李蓝、周政先生发表了《陕南方言的分区》的报告,其中关于历史行政区划与方言关系的讨论,与笔者最近的思考不谋而合,对笔者多有启发。

② 郭沈青、博士生孟万春、硕士生李文娟(当地人)分别调查过镇安木王镇赣语方言,结果都不同,尤其是一些重要特点的调查结果不一致,说明这个方言岛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入细致调查的必要性。

方法外,还应采取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从而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1. 地理语言学方法 面对陕南这样复杂多样的方言,仅仅停留在为分区所作的初步调查上是远远不够的,而选择较密集的方言点,选择一定量的方言条目,进行地理语言学方法的调查研究,画出方言地图,可以直观地展示方言的复杂性,而且对各种来源、类型的方言的地理分布,形成更加明晰的认识,并进一步探讨汉江在方言特点扩散中的作用。

2. 社会语言学方法 陕南的大部分外来方言与本地话之间,各种外来方言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接触,有些县里,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就有几种方言,这些方言在互相之间的作用和当地权威方言、共同语的影响下,正在发生变化。在这种地方,可以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选取不同来源、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发音合作人,用若干项语言特征和指标进行调查,观察系统内部的变异情况,看看哪些特征发生了变异,哪些正在发生变异;在方言特征的变异中,哪些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哪些因素的作用明显,哪些因素的作用不明显;方言变异以至变化的趋势是什么,方言和方言融合在一起以后,朝什么方向演变,等等。研究的结果可以同双向比较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对双向比较的结论加以解释,并预测该方言变化的进一步走向、速度等。

陕南地区是方言调查研究的宝地,是考察方言接触的活标本,又是进行地理语言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理想对象,具有其他方言不能替代的研究价值。陕南方言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头,只要我们能够开展扎实的工作,就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 参考文献:

[ 1 ] 邢向东,郭沈青.晋陕宁三省区中原官话的内外差异与

###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dialect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XING Xiang-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there exist abundant dialectal resources, such as Zhongyuan Guanhuà, Jianghuai Guanhuà, south-west Guanhuà, Gan dialect, etc. which constitute a complicated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made clear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ialect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ories mindset, the theory of contact between dialects, the study of geography linguistics and immigrant history combining with and corroborating dialectal description each other, dialectal influence on the direction of dialectal drif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al blend and cultural blend. The main methods of study are the systematic and deep investigation and description,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methods, social linguistics method. Key words: dialect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contact between dialects; theories mindset; the methods of study

分区[ J]. 方言, 2005 (4).

[ 2 ] 邢向东. 陕西省的汉语方言[ J]. 方言, 2007 (4).

[ 3 ] 薛平拴. 陕西历史人口地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 M]. 香港: 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1987.

[ 5 ] 唐爱华. 宿松方言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10-186

[ 6 ] 周政. 关于安康方言分区的再调查[ J]. 方言, 2006 (2).

[ 7 ] 汪化云. 鄂东方言研究[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4: 236-243

[ 8 ] 李金陵. 潜怀方言研究[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13

[ 9 ] 郭沈青. 陕南西南官话的内部差异与归属[ J]. 方言, 2006 (2).

[ 10 ] 葛剑雄, 吴松弟,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六卷[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11 ] 陈良学. 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12 ] 周政. 安康方言内部分区概说[ M] //陈学超. 国际汉学集刊(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07-331.

[ 13 ] 郭沈青. 陕南“客伙话”的性质和归属[ J]. 中国语文, 2006 (6): 499-509.

[ 14 ] 郭沈青. 陕南中原官话的性质与归属[ J]. 语文研究, 2006 (4).

[ 15 ] 葛剑雄, 吴松弟,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五卷[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16 ] 安介生. 山西移民史[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318-344

[ 17 ] 张晓虹. 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 18 ] 周政. 陕西平利洛河方言同音字汇[ J]. 方言, 2005 (4): 344-355

[责任编辑 赵琴]